

09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二〇〇六年第二期总第一一八辑



上海儿女在 黑龙江

下册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上海儿女在黑龙江

下册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主 编 钟修身

副主编 陈汝南



上海儿女在黑龙江 下册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黑龙江卷）
（2006年第2期，总第一一八辑）

出版：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上海市北京西路860号）

印刷：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市殷高路23弄28号）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出版日期：2006年 3月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6109

定价：36 元

国内统一刊号：CN31-1229

目 录

1 我在北大荒的教师生涯	李昌海
23 从内蒙到呼玛	何 欣
35 我为电厂作贡献	潘志根
38 我在呼玛学会计	毛 颖
44 豆腐房里搞革新	史美祥
46 在“三线”的日子	徐顺友
50 情系北大荒	史国达
63 美好的鄂乡岁月	阮显忠
69 余庆上沟设点	黄大信
77 三合战斗村轶事	白益淮
88 七星泡农场生活漫忆	丁金龙
96 那年冬季 那年春节	盛文秀
104 筑路	赵 伟
110 窑地	杨海枫
114 引嫩工地生活杂忆	吴才海
122 在林海雪原	高 行

126	知青张小亚的故事	李 宁 张小亚
134	我的故事	益浩波
141	当年的奇遇	杨剑豪
152	那年 那月 那些事	包 雷
165	工伤以后	赵兴伟
168	我的棺材	陈宜芳
172	无题（三则）	段晓楣
177	探亲假	唐 坚
181	高岗屯	陶建义
185	摘掉“永固”锁	奚明华
192	被封杀的凄楚恋情	聂玉美
196	苦涩而沉重的回忆	袁子伟
205	我的读书和上学经历	刘 琪
232	难忘 1977 年高考	郑建栋
235	报考大学的日子	蔡鸿声
240	那年高考	马根富
248	在北大荒走上新闻路	张持坚
254	从“科研班”到“农大”	陆红珠
259	我曾是共和国的押运员	孟庆铭
273	荷锄三十年	贺兆坤
282	眷恋边陲沃土	贺兆坤
288	姜沛萍眼中的张大东	丁启华
293	桦树排子的回忆	庄康表
298	大兴安岭暖如春	徐 建

我在北大荒的教师生涯

◎ 李昌海

从上海到黑龙江

从1974年5月31日到2000年11月1日，我在黑龙江垦区工作了整整二十六年六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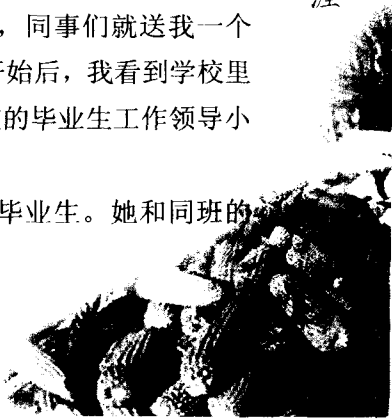
我去黑龙江的时候，不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高初中毕业生，而是已经在上海的中学里工作了十二年的教师。

1962年我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上海市四平中学（当时是完全中学）任教，第二年就担任语文教研组长。在大学分配之前，学院里有分配去新疆和西藏的名额，我曾经几次要求过，可能是学校考虑我家里母亲已故、父亲有病、妹妹幼小等方面的困难，没有批准。

在四平中学工作期间，曾经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但是都没有成功。有的因为我的家庭困难，负担太重而不愿意；有的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家属劳保而分手；有的因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被其家长切断；还有的因为我身体差而根本不考虑。文革开始，我已经是26周岁的人了。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大龄青年了，而轰轰烈烈的“革命”，使你无法考虑属于“个人”的事了。

文革的激烈斗争和无休止的活动，使我的身体更差了。胃出血、胃穿孔，不得不进医院动手术。自此以后，同事们就送我一个雅号——半条命。1968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开始后，我看到学校里大家都很忙，就不愿意在家养病，被安排在学校的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后改称上山下乡办公室）协助工作。

我的妻子黄燕嫻，是四平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她和同班的





陈爱凤，一个是团支部书记，一个是班长，她们两人放弃根据当时政策安排的到上海工矿工作的机会，坚决要求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因为高一时我当过他们的班主任，她俩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要求我帮忙批准她俩。她们哭着闹着，不同意就不走。已经是中午了，我买来饭给她俩吃，但她俩就是不吃饭。僵持了很久以后，我请示了虹口区毕业生办公室，直到得到区毕业生办公室同意给四平中学增加两个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名额的答复时，两人才破涕而笑，拿出自己带来的饼干吃了起来。

黄燕娴到了兵团以后，虽然身体瘦小，但工作积极，安排什么工作就干好什么工作。她放过猪，干过各种农活，当过文书，也当过连队小卖部的售货员。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去兵团不到一年半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被推选为党支部委员和团党委委员。

2 学生上山下乡以后，为了及时了解他们的情况，向有关方面正确汇报，我和赴各地的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平常我和学生的关系比较随和，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和我通信，而且往往是无话不谈的。

1972年春，黄燕娴来信问到我的个人问题，我把情况说了一下。她在后来的来信中，大胆提出和我谈对象的想法。我当时正带领学生在崇明县学农，接信以后就找平常关心我的两位大姐级的老师商量。她们一看就笑了，因为她们都教过黄燕娴，而且十分了解她。她们认为如果能够解决两地分居问题，那是很好的。她们说，你们相互都了解，也好省去谈恋爱的时间。不过她们也担心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适应北方气候。我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黄燕娴，让她仔细考虑，并且一定要征得父母同意。事实上黄燕娴在给我来信的同时，已经给支内去江西的父母去信。因为我在1963年任班主任做家访时去过她家，她父母对我也就比较了解，所以已经同意黄燕娴的选择了。我已经没有母亲，父亲只要我的生活有人照顾，他就放心了。而前一年，黄燕娴回上海探亲，曾经看望过我，

我送她走时，父亲就认为她是我的对象了。后来告诉他，我找的对象就是上次来过的女孩，他自然很高兴。

1972年底我们在上海结婚了。因为我在上中学和上大学时都有到过边疆到农村去的想法，因此是不是到黑龙江落户，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艰难的选择。更何况1969年6月我曾经代表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护送上海青年到过黑龙江，看过不少生产连队，也去我自己妹妹所在的延军农场看过。我的另一个妹妹当时也在兵团前进农场。还有堂妹、表妹也在兵团。可以说，当时我已经比较熟悉北大荒了。

1973年七月下旬，虽然刚刚结婚半年，但学校照顾我，给了我一次探亲假。我第一次来到了离开当时闻名全国的珍宝岛不远的八五四农场。在黄燕娴所在的连队，我受到知识青年和老铁道兵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他们带我去晒场，看堆积如山的麦子；带我到地号，让我站到康拜因上，看机械收割。这些我过去都只是在电影里见过的，现在实实在在看到了。在农场，我还看到一个现象：有不少学生是每天骑车或步行十多里地去上学的。

从农场回到上海，我通过学校向虹口区委递交了一份报告，表示了到北大荒落户参加边疆建设的愿望。等了很久没有回音，我又分别给当时的市委和区委领导写了信。很快，市委把信转发给区委，区委领导指示有关部门立即与兵团联系办理调动手续。终于，我实现了落户北大荒的愿望。

1974年5月31日我终于把家搬到了北大荒，在八五四农场落户。农场根据我原来的特长，把我分配到农场中学。学校又让我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

烧火做饭闯难关

当时农场的生活条件确实很差。场部是个山坡，我家住在坡中



间，吃水要到下坡的水井去挑。井很深，要费很大力气摇辘轳才能打上水来。冬天，井台四周围都是冰，很滑。我一走近井台，心就咚咚跳。

头一年夏天，正好遇到干旱，井边担水的人天天排起了长队。妻子正怀孕，挑水的任务只好我去完成。说实在，学生时期我也挑过担，但那时年轻，而且身体好。现在，浑身半条命，这担子压在肩上，就是给人看笑话。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一担水要停三、五次。曾经有几个女青年，挑着水从我面前走过，看见我挑水的样



中心校全体知青女教师，上海知青：孙佩芳，吴晓蓉，戴玉萍，邹农；
齐齐哈尔市知青：初桂琴。

子，几次回过头来看，悄悄地说：“这个人挑水真费劲，要是认识他，真想帮他挑几挑。”我听了连头也不敢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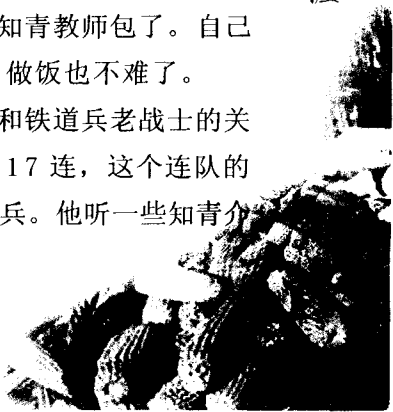
一个星期天，又是干旱。中午，家里的水缸露底了。我吃过午饭担起水桶就去打水。几个井台都是长长的排队打水的人。我不敢排队，怕白排。我转了几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人少的。正在无奈时，一位天津女青年看到我，就叫住我：“老师，你打不到水吧？跟我来，我给你水。”她把我领到牛奶场的贮水塔下面，打开水龙头，为我灌满两桶水。“这水是我们准备留给牛喝的，早晨才抽的，干净的。”我谢过以后就挑回家。谁知道，走到家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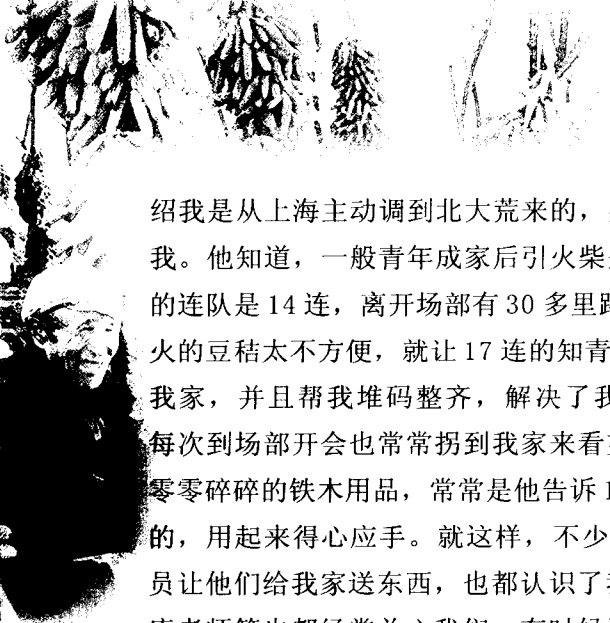
前，踏上架在干水沟上的木板时，脚一软，两桶水就倒翻在身上和水沟里。我把水桶扶起来时，只剩下半桶水了。妻子听到“哐当”声响，赶忙出门，一看这情境，连声宽慰我说：“还好，还好！还有半桶。赶快进去休息！”我这转了一大圈差不多是两个多小时，天上太阳晒得辣忽忽的，头晕、腿软、浑身无力，上了炕一躺就睡着了，醒来已经是吃晚饭时了。

烧火做饭也是难事。定粮比上海多，但一人一个月才配给二斤大米，煮粥还不够，哪能做米饭！只能做馒头。这蒸馒头是个功夫活，只好由妻子来料理。我就当火头军烧火。也许是柴火湿，也许是烟道不通畅，也许是风向问题，这炉灶总是不好烧。半天才烧开水。生馒头放进去要用猛火把蒸气逼上来，可我烧的火就是幽幽的，烧不出气。我家的馒头，十次有九次是僵的。有时三个小时还不能吃上饭。隔壁的张燕侠老师只要看到我被烟熏得流着眼泪鼻涕，就知道今天的饭又没有做好。

后来，挑水的事基本上由学校的单身上海知青教师包了。自己慢慢捉摸出了烧火的技巧，又经常掏掏炉灰，做饭也不难了。

在农场四年的生活中，我得到了许多知青和铁道兵老战士的关心和帮助。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生产连队是17连，这个连队的指导员赵述九是位1956年就转业来北大荒的老兵。他听一些知青介





绍我是从上海主动调到北大荒来的，身体不好，于是也来主动关心我。他知道，一般青年成家后引火柴是最需要的。我妻子原来工作的连队是14连，离开场部有30多里路。赵指导员感到从14连运引火的豆秸太不方便，就让17连的知青拉了一马车脱粒后的豆秸送到我家，并且帮我堆码整齐，解决了我做饭引火的困难。赵指导员每次到场部开会也常常拐到我家来看望我，嘘寒问暖的。家里有些零零碎碎的铁木用品，常常是他告诉17连的知青和老职工帮助加工的，用起来得心应手。就这样，不少17连的知青就是因为赵指导员让他们给我家送东西，也都认识了我。在他的影响下，十七连的唐老师等也都经常关心我们，有时候还特意送一些新鲜的蔬菜给我家。像赵述九这样处处关心我的老同志在八五四农场还真不少，他们给我和知青们以热情的帮助。

6

墙倒下大难不死

那年代，农场是上午七点上班。为了不耽误上班，我们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1974年8月的一天，清早，我和妻子照例在四点多起床。我烧火烧水，准备蒸馒头，她先整理床。我做惯米饭，不会揉面，揉面的活照例由妻子来做。一块大的面案板支在灶屋的西北角，北面是后墙，西面是过道的隔墙，房门就在隔墙与炉灶之间。此时妻子已经怀有9个月的身孕，她见我已经把火点着，就起来揉面。面揉好了，要让面醒一醒，然后才能再做成馒头。妻子就走向南屋去歇一歇。她刚刚走进里屋，我正要从烧火的炉灶旁站起来直一直腰，突然轰然一声，满屋尘土飞扬。我睁眼一看，吓傻了——那堵走廊的墙已经倒下大半截，砖头已经落在我的脚边。那块厚厚的面板已经被拦腰砸断，揉好的面团和面粉已经和砖头、沙土混杂一起。这之前居然没有半点儿预兆。

我惊呆之后又很庆幸，就差那么几秒钟。多么惊险呀！三条人

命哪！两个大人，一个马上要出生的孩子！从鬼门关里闯了过来。对门邻居张老师听到声音，夫妻俩赶过来一看，也惊呆了。但看到我们两口还在恐惧之中，马上安慰我们：“还好，还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隔壁的张燕侠老师也跑过来看，不断地说：“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并且马上把我们两口领到她家，让我们吃完早饭好去上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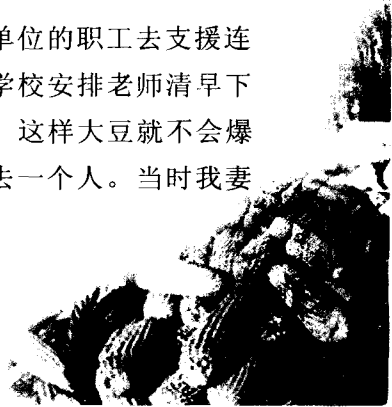
学校教职工都住在一起。墙砸下来这件事马上都知道了。学校马上派工人来清理砖块，重新砌墙。年纪大些的家属指着黄燕娴的肚子说：“嘿！小黄，你家孩子真命大福大呀！”十四连的知青知道面板被砸断了，马上做了一大一小两块面板送过来，还关照：灶间太暗，以后揉面可以在里屋揉，其实是让我们心理上不要草木皆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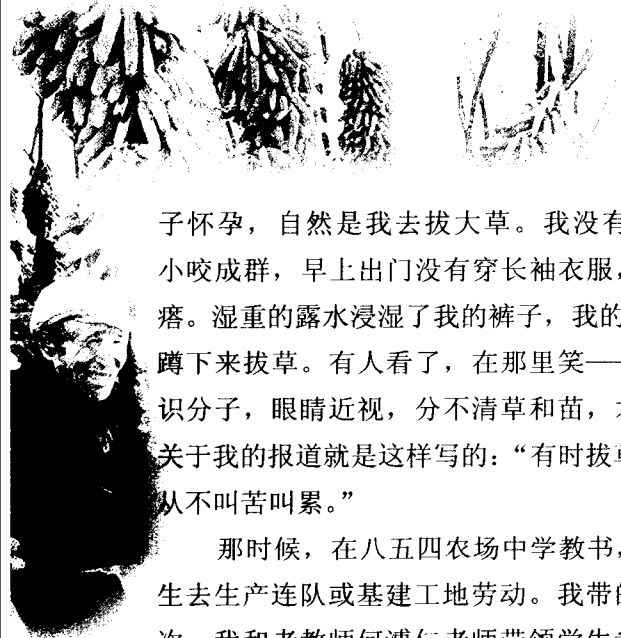
不过后来，我也不大敢去靠那些单薄的墙。因为有些墙是没有地基的，或者只是和了一些泥沙浆，没有粘着力，水浸、干旱、风吹等各种因素都会使它们倒塌。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这个被同事们称为“半条命”的人，刚到黑龙江的几年，由于过去的劳累和当前的生活条件不太适应，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一次我胸口疼痛剧烈，而且放射到肩头，我以为是胃痛，无奈之下到医院急诊。医生检查以后，告诉我这是心绞痛，是由劳累引起的，必须静止休养。但是那个年代是主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何况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只是稍事休息以后就又投入工作。

在农场，每当夏秋时节，都要抽调场直单位的职工去支援连队，或者安排义务劳动。刚到学校没多久，学校安排老师清早下大豆地拔大草。拔大草都是在露水未干之前，这样大豆就不会爆荚。学校规定，家里两口都是学校的，每家去一个人。当时我妻





子怀孕，自然是我去拔大草。我没有经验，不知道大豆地里蚊子小咬成群，早上出门没有穿长袖衣服，结果两只胳膊被咬得满是疙瘩。湿重的露水浸湿了我的裤子，我的关节炎发了，站不住了，只得蹲下来拔草。有人看了，在那里笑——笑话我这个从大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眼睛近视，分不清草和苗，才蹲下来辨认的。后来有一篇关于我的报道就是这样写的：“有时拔草，他眼睛近视，就趴着辨认，从不叫苦叫累。”

8 那时候，在八五四农场中学教书，无论是不是班主任都要带学生去生产连队或基建工地劳动。我带的是高中学生，劳动更多。一次，我和老教师何溥仁老师带领学生参加基建劳动。太阳在头顶照着，任务是搬砖。干了一阵之后，我感到心绞痛发作了。为了避免影响学生，我含了硝酸甘油，但仍然止不住，只好忍着剧痛悄悄走开。谁知没有走多远，疼痛加剧，痛得趴在地上，手紧紧地攥住地上的砖块，脸上的汗珠滴滴答答掉到地上。何老师刚才已经发现我脸色不对，这时发现我不在身边，就抬头寻找我。他看到我倒在地上，马上带两位同学过来，见我脸色煞白，忙把我架到公路边。他们截住一辆卡车，开车的正好是上海知青，他一看是我，二话不说，加快油门把我送到农场医院急救。第二天，我仍然带领学生去参加劳动，但何老师和同学们监督我，不让我干重活。

恢复高考那一年，规定文科要考历史。要复习历史，而学校里没有历史教师，我就主动担起复习的担子。学生没有学过历史，也没有课本。学校里也没有这方面的书。我只好把自己保存的50年代的历史课本拿出来作参考进行备课。对学生来说，历史既新鲜又枯燥。要完成这样的复习任务，确实是很辛苦的，往往每天备课到凌晨三、四点，七点半就要去上课。这样，身体自然会吃不消。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上午第四节课，我在讲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在黑板上刚刚写下“罗伯斯庇尔”几个字，突然心绞痛发作，难以坚持。我看离下课还有五分钟，就让学生看书，和前排一个学生说了

句话，自己悄悄地到学校对门的医院看病去了。医生见我痛成这个样子，连忙用电话请来院长周殿开会诊。周院长用半针吗啡给我强行止痛，又马上让住院部腾出一间空病房，强行收下住院。吃午饭时，妻子不见我回家，以为我有别的事。下午学校到上课时间了，也没有看到我。教导主任去问学生，才知道我去了医院。

在农垦师范时，有一次也是上午第四节课，我给学生分析完都德的《最后一课》后，表情朗读课文。当我读到课文末尾韩麦尔先生说，“放学了，你们走吧”时，我感到支撑不住了。此时正好下课铃声响了，我就把身体就势靠到黑板上，一手扶住粉笔槽，轻轻地说“下课”。同学们以为我还沉浸在表情朗读的高潮中，都很高兴地离开了教室。后来有几个细心的女同学发现我的脸色不正常，额头已经沁出汗珠，才知道老师这不是在表演，而是突然发病了，连忙找来男同学把我抬到卫生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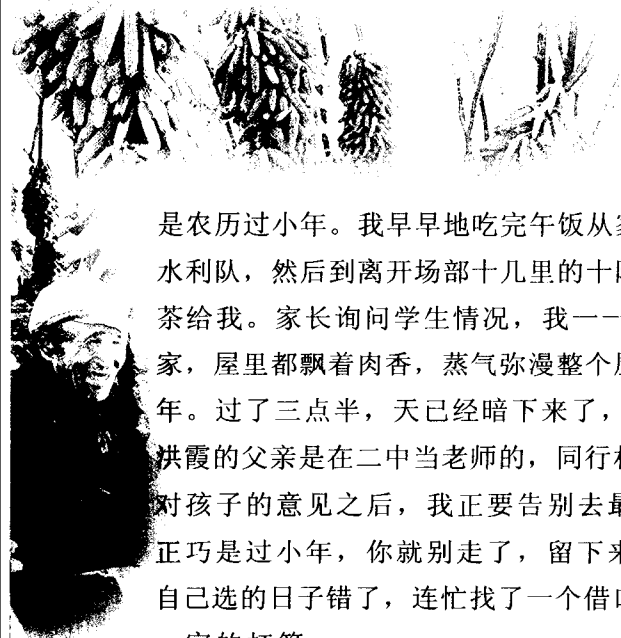
踏雪家访夜归寒

在上海任教的时候，我就有经常访问学生家庭的习惯。凡我当班主任的班级，每个学生的家庭我都会访问到。有的家长晚上11点下班到家，我就在11点去访问。当时的学生都集中居住在几条里弄里，因为我去家访的次数多了，里弄里的老老少少都认识我。我走进弄堂的这一头，那一头的学生就已经知道我来了。

到黑龙江以后，我仍然保持家访的习惯。但农场的学生住得分散，有的住得很远，离开场部有几十里。我利用星期天及平时的晚上就近访问住在场部的学生家庭，和家长沟通。路远的，我就利用寒暑假去访问。学校没有规定教师访问家庭，也不报销车费，我又不会骑自行车，所以除了可以借助火车的地方，其它地方我都是走着去的。

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三日。我们已经习惯记住公历，忘了这一天





是农历过小年。我早早地吃完午饭从家里出发，先到离场部较近的水利队，然后到离开场部十几里的十队。学生和家長都很热情，端茶给我。家長询问学生情况，我一一给予介绍和分析。走进每一家，屋里都飘着肉香，蒸气弥漫整个屋子。我还没有想到这是过小年。过了三点半，天已经暗下来了，我走进王洪霞同学的家。王洪霞的父亲是在二中当老师的，同行相见自然很高兴。我们交换了对孩子的意见之后，我正要告别去最后一家，王老师说：“今天正巧是过小年，你就别走了，留下来一起吃饭。”我一听，知道自己选的日子错了，连忙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他家，也放弃了再访问一家的打算。

10

走出王老师的家，外面飘起了大雪。走到路口，我感到两膝关节疼痛，行路艰难。走了几步实在迈不开步了，就只得坐在地上。就这样走走坐坐，时间很快过去了。我想截一辆方便车，搭一段路，但黑夜里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僻地方，司机哪敢搭人。一辆林业局的车辆被我截住了，驾驶室里只有司机一人，车停下了，我刚刚让开道走到车门旁要说话，“呼”一下汽车就向前冲去。

我知道，我已经没有本事截车了，只得忍住疼痛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从中午到此时已经七八个小时了。雪，时大时小，凛冽的寒风吹得我浑身颤抖。此时我真的感到饥寒交迫，如果不动，很有可能被冻死在这条道旁。我坚持着一瘸一拐地走回家，等到看到场部的灯光，我才放下心来。

推开家门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桌子上的菜还放着，妻子已经躺在床上。见我进门，她用爱怜的眼光看着我，没有半句埋怨的话语，马上把手中灌着热水的盐水瓶递到我手中。她帮我脱下棉胶鞋，脱下袜子。我的脚已经冻得麻木了，冰冷冰冷的。妻子忙让我躺倒在炕上，躺在她的脚后。她撩起贴身的棉毛衫，把我那双冰冷的脚提起来，贴到她的胸口上。当我的脚接触到她的温暖的胸口时，我的眼睛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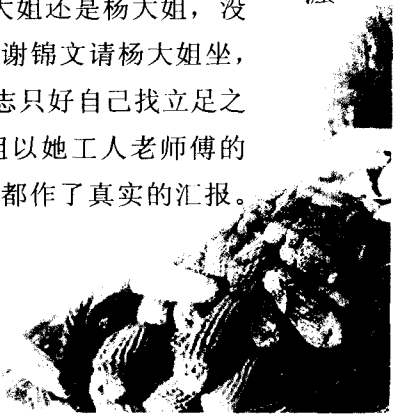
杨富珍来访解屋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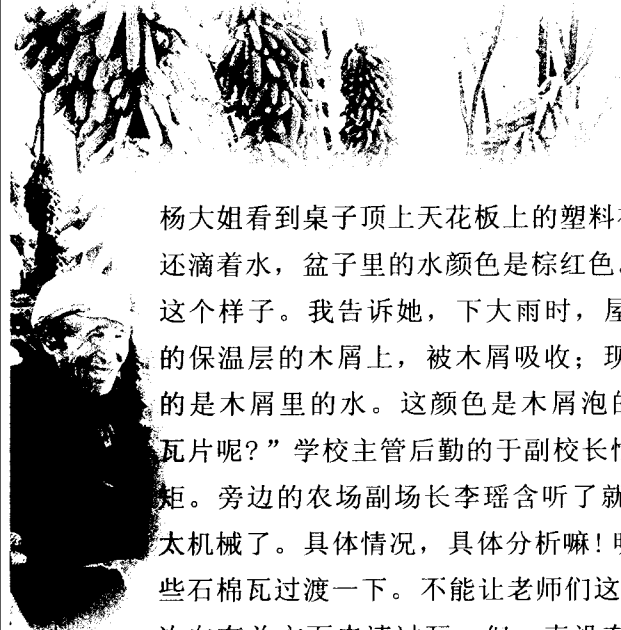
到农场的第二年，我分到了新住房。农场的房子是“一年毡，二年漏，三年才能挂上瓦”。我住在房子的西头，过了夏天到了秋天，头年挂的油毛毡就都裂开了。秋雨下来的时候，屋顶上到处都漏雨。这次一场雨下得特别猛，河沟里涨满了水，道路都成了稀烂泥路。另外四家虽然也漏，但没有我那样严重。我那时真正体会到杜甫诗句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境况了。小小的屋子里，满眼都是瓶瓶罐罐，凡是可以盛水的东西都用上了。我的炕上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盆和碗，书架上钉着一块大塑料布，饭桌上方也是一块大塑料布，地上放着一张铝澡盆。因为“床头屋漏无干处”，夫妻俩晚上只能抱着孩子轮流睡觉。

那时杨富珍大姐挂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头衔，受命到黑龙江慰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她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和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赴黑龙江省慰问团介绍我的情况，就特意要到我家来看望我。

她来我家这一天正是久雨刚晴，天气特别好。杨大姐在兵团司令和兵团四师常委上海知青谢锦文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我家。听到吉普车的声音，我就迎了出去。我家门前的一座桥坏了，她们就下车走过来。

家里没有做过任何掩饰，也无法掩饰。只是把地上的盆盆罐罐撤了几个，留出站脚的地方。一伙人进门以后，来的领导介绍说：“这是上海市委的杨富珍书记，来看看你们。”杨大姐说：“别叫我杨书记，叫我杨大姐吧！”顿时我感到杨大姐还是杨大姐，没有变。我家只有一小块地方可以放一张椅子。谢锦文请杨大姐坐，杨大姐看看周围，不好意思地坐下来。其他同志只好自己找立足之地，站在周围，有的人只得退到门外。杨大姐以她工人老师傅的态度，详细地问了我的生活、工作等情况，我都作了真实的汇报。





杨大姐看到桌子顶上天花板上的塑料布还存着水，旁边的天花板上还滴着水，盆子里的水颜色是棕红色。她很关心地问，怎么会漏成这个样子。我告诉她，下大雨时，屋面板漏的水漏到天花板上面的保温层的木屑上，被木屑吸收；现在外面不下了，里面滴下来的是木屑里的水。这颜色是木屑泡的。杨大姐问：“那为啥不上瓦片呢？”学校主管后勤的于副校长忙老老实实回答新房挂瓦的规矩。旁边的农场副场长李瑶含听了就说：“老子，你也太老实了，太机械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明天你就到我这里来，先领一些石棉瓦过渡一下。不能让老师们这样过日子。”于副校长确实多次向有关方面申请过瓦，但一直没有得到，现在一听老场长这么说，自然求之不得，高兴地说：“好！好！明天我一早就去。抢在下一个雨天前盖完。”

12

杨大姐看到我家前面还有一片菜园子，问问吃菜的情况。我们告诉她，菜园子的菜夏天够吃。春秋冬还得靠买。杨大姐觉得我们的生活实在是艰苦的。

李瑶含副场长对知识分子是很关心的，他后来对我说：“李老师，你以后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像你这样能够到农场来，真是不容易的。”

第二天中午开始，马车连续把盖屋面的石棉瓦运来了。不到一星期，石棉瓦就挂上了屋面。同一栋房子的老师都对我说：“多亏你了，要不然，我们明年开春也得漏成那个样子。”

一餐饭险遭批判

我到农场之后，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妻子又生得弱小，家里许多花力气的活都是学校里一些下乡知青帮助做的。冬天，他们帮我上山砍烧火柴，劈拌子。夏天，他们帮我挖菜园子，种自留地。秋天收菜园子和自留地。我家里水缸里的水是他们轮流到井台去挑